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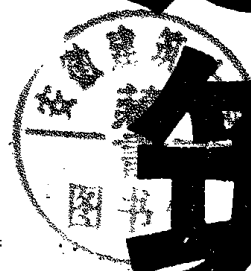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建筑

主编 陈同滨 吴东越 等

中国出版社

室内装饰图集

中国古典建筑



室内装饰图集

(京)新登字 132 号

中国古典建筑室内装饰图集

陈同滨 吴 东 越 乡 主编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遵化市育才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16 开本 71 印张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5072-0761-7/J·222 定价:230.00 元

前言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是中华民族主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世界建筑文化不可忽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当今社会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事业一方面面临着广泛的冲击和毁坏,一方面却又面临着文化市场的广泛需求。因此,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传统资料进行整理亦成为一项迫切的文化任务。为此,我们以建筑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角度,试从浩瀚的古代典籍、尤其是绘画领域,对有关中国古代建筑、城市、园林以及室内装饰艺术(以下简称“建筑类”)的形象资料进行了初步收集,并按时间顺序纂为图典,作为间接的形象史料提供给从事科技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研究工作者参考,以期对中国古代建筑类形象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亦可供社会各有关行业在涉及这一范围时取作图式参考。

中国古代建筑类的形象史料除现存的实物之外,尚有相当一部分以间接的表现方式留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若按考古的界线划分这些史料,大致可分为地下和地上两大类遗存:地下部分主要包括从古墓穴出土的各种器物遗存(如铜制礼器、陶制明器等类),砖石遗存(如画像砖石、墓穴内部的构件装饰)和墓壁画;地上部分的间接资料则多以平面表现的方式留存于传统绘画艺术的各个领域,如:壁画,山水画,人物画,风俗画或历史画,版画与年画,以及某些器物画中。由于中国古代建筑及其室内装饰的早期史料甚少,地下遗存部分颇受建筑历史及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多经选择整理,编入史册;地上部分虽有大量实物留存,但多为清代式样,尚不足以反映整个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建筑类形象与文化。因此,本书较为侧重清中期以前的资料收集。作为初步尝试,本文试将资料来源依照绘画种类分为以下五种,分别进行叙述。

(一) 器皿画

有关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形象资料最早来源于殷商的甲骨文和铜器画:甲骨文取象形表意,因此在字形中多包含着建筑原型的轮廓形象;铜器画则有两种内容与建筑有关:一是图案,一是表现人们生活场景的简易建筑形象。图案又可分为动物纹、天象纹和几何纹。其中:动物有饕餮、夔、龙、蟠螭、虺、象、凤、鹤、蝉、蚕等纹样,天象物候则有云、雷、波浪等纹样,几何型有漩涡、三角、方格、菱形、连珠、绳纹、沙粒、垂幛等纹样,这些纹样在早期建筑遗存中多有表现。简易建筑形象在铜器图象中较图案为晚,主要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铜匱、铜鉴、铜栳、铜枋等器物上。由于铜器在先秦、尤其是殷商多用作礼器,因此它的造型与图案纹样皆可谓是先秦艺术的代表。

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王权和意识形态中的世俗倾向有所加强,血缘社会的文化特征渐趋丰富。及至汉代盛行厚葬之风,有血缘关联的亲属多采用画像石或画像砖来装饰死者墓穴。因此有关建筑类的形象史料在秦汉之际,主要来自瓦当和画像石、画像砖。

(二) 画像石和画像砖

画像石和画像砖主要用于古代的氏族祠堂和陵墓、崖墓建筑。镌刻手法有阴刻、阳刻和阴、阳结合三种,图形内容与铜器类似,可分为图案与场景两大类。汉代建筑的图案题材较之先秦时期大为扩展,尤其是人物和植物纹样有丰富的表现。植物以卷草、莲花纹样为多;人物纹样题材甚广,内容包括:手工生产场景,神话传说,帝王圣贤和节孝故事的生活场景,如车马出行,宴请乐舞,战争狩猎,甚至包括杀鸡宰牛、张席摆盘等场面。其中的车马、人群造型皆表现出明显的风格化倾向,颇富装饰效果。画像的分布位置多在石室的四壁、石门及门楣等构件处。

汉画像石分布以山东、河南、四川、江苏等地区的遗存较为重要,其中涉及建筑形象及其图案的有:山东的嘉祥武氏祠、肥城孝堂山郭氏祠、沂南地区石墓;河南南阳地区的石墓;四川涪江、嘉陵江流域的新津、乐山崖墓;江苏徐州地区的睢宁、芳村、茅村及沛县、铜山和陕西绥德等处石墓。其他地区如辽宁、陕西、山西、安徽、浙江等亦有少量发现。

汉画像砖分布以四川、河南为多,山东、安徽、江苏及浙江亦有所发现。其中涉及建筑及其图案的有:四川的成都、广汉、彭县、新繁等地,特别是广汉出土的市井图砖,形象地表现出汉代城市中“市”的布局与活动,是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史的重要史料;河南新通桥出土的空心画像砖中,涉及阙楼、房屋的形象甚多,亦是研究汉代宅屋、宫阙等建筑的重要史料。

画像砖、石以汉代出土最多,其后的北魏、东魏尚有少量石室画像。如:河南洛阳的北魏孝昌间(525—527年)宁懋石室画像等。南北朝之后,石作艺术以石窟为最,装饰与表现手法趋向雕塑与彩绘壁画结合,平面图刻方式渐趋式微。

除画像砖、石之外,碑刻图也是建筑史料的重要来源。由于碑刻方式多用于记事,摹刻图形讲求写实,故对历史研究甚为有益。较为重要的实例有:北齐《周荣祖造像》碑、山西晋城古青莲寺唐敬宗宝历元年碑刻《佛寺图》(825年)、宋元丰三年(1080年)刻《唐兴庆宫图》残碑、山西万荣县金天会十五年刻《汾阴后土祠图碑》(1137年)、河南登封县金承安间(1196—1200年)刻《大金承安重修中嶽庙图》碑、苏州宋绍定二年刻《平江府图碑》(1229年)、西安明正统间(1436—1450年)刻《薦福寺殿堂图》等,清代碑刻遗存较多,有成都西郊的《少陵草堂图》、上海嘉定的《猗园图》、陕西华阴的《敕修西嶽庙图》、山东《登州府蓬莱阁图》和曲阜的《孔林图》以及苏州光绪十年刻《沧浪亭图碑》(1884年),等等。有关建筑史料的碑刻图应还有许多流布民间,待作集中的整理和研究。

继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一大变化是佛教兴起。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大肆兴建佛教建筑,如北朝孝文帝时期全国佛寺计达三万多所;同时,石窟寺亦受印度佛教文化及犍陀罗艺术影响而广为开凿。随着佛教文化的发达,用于图解佛经和装饰寺庙、石窟的壁画大为发展。这一进展不仅为中国建筑的艺术传统作出极大贡献,同时也遗留下一些有关当时建筑、造园与装饰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故而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宗教壁画取代汉画像砖、石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画的主要类别之一。

(三)壁画:

壁画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谓历史悠久,亦是建筑的重要装饰传统。纵观世界建筑历史,早在几千年前的各类早期文明的建筑、尤其是纪念性建筑和宗教建筑遗存中就饰有壁画,并伴随文明的各个发展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壁画在建筑画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直接用于建筑装饰的画作,一方面在许多画作中包含有建筑的历史形象,具有间接的建筑史料意义。

中国壁画的文字史料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孔子家语》所载:孔子曾观周之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戣,南面以朝诸侯之图”;史料又载“有周盛时,褒赏功德。……独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乃绘像于明堂之墉”。可见周之壁画用于辅佐政教,扬善诫恶,即所谓“成教化,助人伦”,专绘于明堂、宗庙等礼制建筑中。

至战国,壁画规模扩大,题材渐广。如王逸《楚辞章句·天问》篇首序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僂僂,及古贤圣怪物行事”。

秦代建筑采用壁画装饰已有实物遗存,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世俗类的宫室建筑。如秦咸阳故城6号建筑遗址和1号、3号宫殿建筑遗址中,均有彩色图案的壁画残块出土,其上多呈黑、红、蓝、黄及石青、石绿等色,颇为厚重浓艳,图案造型的风格强健规整。

自汉以降,壁画开始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的装饰。除前文所提及的礼制建筑、宗教建筑和宫殿建筑之外,祠堂、衙署、驿站、墓穴等诸多建筑类型均有涉及。其内容、形象及意义,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曾有描绘:“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仿佛。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下

及三后……。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戒世，善以示后。”

壁画的分布方式大致可分为地下、地上两种：地下为墓壁画，地上为建筑壁画。建筑壁画的题材常与建筑的使用功能有关，可分为宗教与世俗两种。宗教建筑壁画用于寺庙、道观、石窟等处，故又可分为寺观壁画与石窟壁画两类，题材皆取宗教性质；世俗建筑壁画用于宫室、祠堂、衙署、驿站、会馆、戏院等处，题材或为神话传说，或为帝王历史故事，或为民间戏曲传说等，亦有部分包含宗教内容者。

墓壁画兴盛于汉，延用于唐，至宋式微。墓壁画与汉画像砖、石同为中国传统建筑早期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实例有：反映汉代室内装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中室北壁之《百戏图》，反映汉代建筑与城池形象最丰富的内蒙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墓《宁城图》，反映唐代城门阙楼形象的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其时建筑画的手法已与后世之“界画”相仿。宋代绘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优秀画师多转向宫廷主持的“画院”，追求绘画自身的艺术性和表现技巧；同时，宋代住宅装饰以厅堂、书斋、卧室悬挂字画卷轴为时尚，墓室中则兴起以仿木构形式的砖雕装饰。因此，宋代不仅在道释画方面大为衰退，传统的壁画装饰方式在建筑和绘画两个领域的地位也多有下降，因而墓壁画在应用和水平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衰退。如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墓壁画所示住宅室内，形象甚为简陋，显是民间画工所作。自此，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资料遂转向以“院画”、尤其是“界画”为主。

宗教建筑的壁画因魏晋南北朝佛教兴起而发达，盛行于唐，至元日渐衰落。宗教建筑壁画一般可分为寺观壁画和石窟壁画，题材或为道释画，或为各种“经变”故事。

寺观壁画据中国通史或宗教史资料分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应在佛教建筑中受到大量应用，如在殿堂和回廊壁面上绘制各种“经变”为题材的壁画。但因中国传统建筑的木结构难以留存，故而能随建筑遗存流传至今的早期壁画实物极为稀少，唯在新疆古楼兰地区的伊循城遗址中发现一处约建于公元3世纪的密兰废寺，墙上尚存有当时的佛教故事壁画。另据美术史资料，可知南朝梁人张僧繇（生卒未详）为南朝佛寺壁画名家，曾于南京一乘寺作“凹凸花”建筑装饰画，并在江南佛寺绘制过大量壁画作品，其艺术水平及理论堪称南朝绘画艺术一代大家。

隋唐的寺院壁画因净土宗的发展和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而更为盛行。据《旧唐书》叙及：“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殫于缀饰，瓊材竭于轮奂。”可见当时的寺观壁画也是极为盛行的。由于留存至今的唐代寺庙建筑遗存——山西五台山地区的佛光寺、南禅寺——中只残存极少量壁画，因而有关唐代寺观壁画的史料主要来自画史、通史等文献资料。隋、唐寺观壁画以及宫室壁画见诸于文献记载者甚多。如名画家中有：隋·展子虔，唐·尉迟乙僧、周昉、张素卿、薛稷、曹霸等，其中又以河南阳翟人吴道子（约685—758年）最为突出，一生作壁画，仅在长安、洛阳寺院道观中便绘有“三百余间”，所画形象穷极变态，脱落凡俗，在艺术上极富才华与贡献，不仅是一代壁画宗师，还被视为中古时期东方最有影响的大画师。

五代与两宋寺观壁画据王伯敏先生文字资料统计，有记载者约数十处，但因元代之前的寺院、道观建筑遗存甚少，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福建等处，其中留有壁画的为数不多，内含建筑形象者更为罕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实例有山西高平县舍利山麓的开化寺，壁画由画匠郭发等人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开始绘作，图中含有楼阁、回廊、桥亭、街市等多种建筑类形，绘作精细，为宋代壁画精品。与此同时，辽、金、夏等国亦有一些壁画佳作，其中以金代御前承应画匠王逵（1100—1167之后）于山西繁峙岩山寺所作《释迦降生图》，为金代建筑的珍贵形象史料。因此，元以前宗教建筑的壁画主要留存于石窟寺。

石窟壁画主要随石窟寺分布于西北地区，如甘肃的敦煌、永靖、天水及酒泉、武威，新疆的库车、拜城、土鲁番（即：龟兹、高昌故址）等处。其艺术水平及风格、题材明显受到“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情况的兴衰影响。在各洞窟的历代画作中，一般多含有装饰图案，是建筑装饰史的重要资料来源；涉及建筑形象者大多在各种《经变》故事中，主要有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处。其中尤以敦煌莫高窟所涉建筑形象及朝代最为广泛，如：隋420窟，唐148窟、123窟、237窟、172窟、217窟、85窟等隋、唐

窟壁画,表现了大量佛寺殿堂以及建筑的群体布局与佛寺造园;五代以 61 窟最为突出,尤其是绘于西壁的《五台山图》,是一幅有关北方佛教寺院的大型画作:其内容反映出由山西太原五台山出发、直至镇州的沿途地理风貌,包括城垣 8 所、寺院 67 处、草庐茅舍 33 座,另有宿店、茶亭若干。该图绘作虽不甚精致,但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元代宗教壁画因世祖忽必烈推崇喇嘛教而有所变化,表现题材转向以佛教密宗和道教两种为主。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已经不多,除敦煌第 3 窟与 456 窟较为精美完整外,全国、尤其是西藏的喇嘛寺院中尚有一些密宗题材的壁画。元代的寺观壁画亦有少量遗存流传至今,如: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壁画(1325 年、1358 年),山西稷山县兴化寺(1238 年、1298 年、1358 年)和青龙寺(1358 年)壁画,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旁明应王殿壁画(1325 年)等。上述各例中,涉及建筑造型最为突出者当数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为张尊礼等人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绘作。

明代因石窟壁画已经衰落,遗存的宗教壁画主要分布于寺观。较为著名的实例南、北都有,如:北京法海寺(1439—1443 年),山西新绛县东岳稷益庙(1507 年),四川蓬溪宝梵寺大雄宝殿(1466 年),云南丽江白沙大宝积宫;另有近年整理面世的四川剑阁县觉苑寺大型佛传壁画,画工不可考,绘制于弘治年间,图中含有大量用界画方式绘作的建筑物,但形象较为粗糙,艺术水平亦不及前述各例。

清代壁画除绘于寺院、道观之外,宗祠、会馆、乃至戏台等处亦广为采用,题材多为戏曲故事和民间传说。其时壁画艺术水平已远不及前述各代,风格、题材多与年画相仿,透露出浓重的世俗趣味。壁画遗存数量则较前述各代多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四)中国卷轴画:

中国画主要题材有三:山水,人物,花鸟。其中除花鸟之外,山水与人物画中都包含有相当的建筑史料。就内容而言,山水画多涉及建筑、园林、名胜古迹及桥、亭等物,人物画多涉及家具摆设及室内装饰。就绘画手法而言,中国画在绘制宫室、舟车等器物的图形时,多采用“界画”方式——以界尺为辅助工具进行绘制。从史料角度考虑,“界画”类形象较为精确,非“界画”类内容更为广泛。择一而论,难免偏颇。故举凡涉及宫室衙署、学宫书院、店铺街市、宅居村落、军事城池、桥厅廊榭者,举凡涉及厅堂、书斋、闺房、家具、摆设以及装饰图案者,举凡涉及名胜古迹和名山、名园者,本书均根据图绘质量的优、劣予以取舍收录,并按画种门类沿朝代顺序依次叙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作流传至今的尚未见真迹,摹本中流传有绪、且与建筑史料有关者唯有: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绘有晋代床榻形象。隋代资料亦不多见,唯有展子虔《游春图》,绘有隋代住宅布局形式。

唐代绘画在山水与人物两方面都有明显发展。其中流传有绪、且与建筑史料有关者主要在人物画中,如: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和《北齐校书图》,传为吴道子学生卢楞伽的《六尊者像》,传为周昉的《挥扇仕女图》,传为韩滉的《文苑图》,李真的《真言五祖像》,孙位的《高逸图》等,皆绘有各式家具摆设,是为隋唐时期重要的家具陈设形象史料;山水画应有李昭道的作品,但未见真迹,甚为遗憾;另有 3 幅故宫藏无款之作,皆以《宫苑图》名之,图中宫殿桥亭等诸多形象错综复杂,是为唐代建筑画的重要遗存。另有佚名之作《南诏图传》,是现存南诏国流传于世的最早画作,图中屋宇形象极为简易,但仍有一定史料意义。

五代十国在历史上位序唐、宋之间,历时仅五十余年,但在文化艺术上则呈现出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对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两大鼎盛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绘画史中,五代画家作品流传有绪、且与建筑史料有关者主要在南唐,有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王齐翰的《勘书图》,图中以界画手段绘制的五代家具摆设形象清晰,具有极好的史料意义;有卫贤的《高士图》绘五代住宅形象,因其长于界画楼阁,能够“折算无差”,故所绘形象可谓是对建筑史中无五代住宅实物遗存的填补;此外,尚有五代界画杰作《闸口盘车图》,传卫贤画,图中所绘磨房、酒楼、彩楼等建筑物形极为精致。

宋代立国,设“翰林图画院”,对宫廷绘画、即“院画”产生极大促进,使中国画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有关建筑形象的画作主要来自卷轴画,且因画风时尚写实,建筑物等多用界画手法绘制,故颇多精彩作品,形象内容亦较之前述各代更为广泛。除家具摆设之外,建筑单体中有一批楼阁名胜,群体中有村落、城镇,风景名胜类景观题材也因南宋迁都杭州而大为增加。因此,中国的建筑画可以说在宋代也发展到了一个繁荣期,其作品以绘作之精、题材之广而超越前述各代,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宋代建筑画主要分布在中国画的四种类型中:山水、人物、风俗与历史。其数量较之前述各代已大为增加,故此不按画类分述,仅择有关建筑类者略加点述。

北宋山水、人物画中,涉及建筑类形象的主要有:赵士雷的《荷亭消夏》,王诜的《绣枕晓镜》与《杰阁凭栏图》,赵佶的《听琴图》与《瑞鹤图》,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与《维摩诘图》,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无款之作《景德四图》等等;另有王希孟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内含渔村野市、长桥水榭及住宅建筑形象与布局多种,建筑史料意义颇为突出。此外,北宋山水画水墨派中的董(源)、李(成)、范(宽)等代表人物,所绘画作虽多涉及建筑名称,但仅用作山水的点缀性配景,形象甚为简易,故对建筑史研究而言难以凭。

南宋的建筑画在题材上更为丰富,在绘作上亦更为精致。其时重要画家有水墨画派的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与青绿画派的赵伯驹、赵伯骕等人,所绘画作多具有建筑史料参考价值。其中以西湖风景和地方风光为主题的画作有:夏圭的《溪山清远图》,李嵩的《西湖图》、《夜月看潮图》,陈清波的《湖山春晓图》,叶肖岩的《西湖十景图册》,无款之作《长桥卧波图》、《深堂琴趣图》、《荷塘按乐图》、《柳阁风帆图》等;以建筑为主题的界画有:赵伯驹的《水阁凭栏图》、《汉宫图》、长卷《江山秋色图》等,所绘形象颇为精巧工整,不失史料意义;赵伯骕的《风檐展卷图》,李嵩的《高阁焚香图》,无款之作《明皇避暑图》、《会昌九老图》、《岳阳楼图》、《仙山楼阁图》、《滕王阁图》、《龙舟竞渡图》、《宫苑图》、《溪亭客话图》、《汉宫图》、《松荫庭院图》、《梧荫清暇图》、《寒林楼观图》、《拜月图》等等,都绘有精巧建筑形象。另有南宋时期的无款之作《金明池夺标图》,绘制颇为精巧工整,内含北宋皇家园林及楼阁等建筑形象。而在绘作艺术水平和表现建筑形象、建筑环境等方面最为完美者,当数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四幅,图中所绘形象疑为当时西湖一带文人富家的府邸庭园,画面极尽优雅精美,堪称中国画中的建筑画杰作。此外,人物画中有:《五学士图》、《村童闹学图》(仇英摹本)、《槐荫消夏图》、《蕉荫击球图》、《维摩演教图》等,道释卷轴画有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等,图中皆含宋式家具摆设等物,可资参考。

风俗画因宋代世俗文化兴起而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如: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叶仁遇的《维阳春市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李嵩的《岁朝图》,马远的《华灯侍宴图》,马和之的《女孝经图》,李嵩的《天中水戏》,以及无款之作《耕织图》、《水殿春游图》、《岁朝图》、《折槛图》、《蚕织图》;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陈居中《文姬归汉图》,传为萧照的《中兴瑞应图》,传为马和之的《鹿鸣之什图》与《清庙之什图》等等。上述画作中大多含有宋代各类建筑及城市的历史形象。其中尤以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的内容最为丰富:图中所绘北宋汴梁(开封)承平时期的舟车市廛之盛况,对街市店铺、官家府邸、村居茅舍、城楼桥梁,包括城市的街市布局等方面多有描绘,是研究北宋城市生活方式与形象的重要史料,唯形象略为简易。《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对画界产生极大影响,其后历代皆有多种名家摹本,风俗画的地位因此而有所提高,描绘城市街景的大型长卷轴画至明、清亦有若干,使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的形象史料得以流传。

此一时期,我国东北与西北地区的辽、金、夏国势先后兴起,在文学绘画上受汉族文化影响甚多,但仍不失其民族特色。其中涉及建筑形象的图作不多,如辽胡瓌的《卓歇图》等。

宋代绘画除上述各类画种之外,由于朝廷居安江南,歌舞升平,世风享乐,市民文化逐渐兴起,民间绘画颇为昌盛。其时,除壁画由官方主持转为民间为主之外,印刷术的发展使得雕版书大为发达,“官私印本,多有图谱”,版画类作品自此开始增多,其中涉及建筑者虽有列女传、佛教经卷的卷首画等,但形象

失之简陋,远不及其时中国画中的界画有价值。唯北宋将作监少监李诫(明仲)于元符三年(1100年)编成、崇宁二年(1103年)刊印颁发的《营造法式》,是宋代建筑乃至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文献和图形史料。

元代绘画就建筑史研究而言,值得重视的范围主要是山水画中的界画。擅长此道者及其主要作品有:王振鹏的《龙池竞渡图》(摹本)、夏永的《岳阳楼图》与《丰乐楼图》等,李容瑾有《汉苑图》,与宋画《明皇避暑图》极为相似;形象颇为工整的无款之作有:《山溪水磨图》、《建章宫图》、《醴泉消暑图》、《广寒宫图》、《滕王阁图》、《黄鹤楼图》、《江天楼阁》、《江山楼阁图》等等。而在山水画领域最为著名者如赵孟頫和“元季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人,虽好于山水布局中点缀茅亭村舍等简易建筑,画作也多取“山房”“渔庄”“松亭”“禅室”等建筑名称,但因元代文人多崇尚出世思想,讲求清逸幽寂,甚至荒寒之境,建筑物特取简易素朴的形象,绘作亦“逸笔草草”,聊以自娱。故元代一流山水画家作品中未见有精采建筑形象。人物画中涉及家具摆设类画作亦不多见,重要作品有刘贯道的《消夏图》,图中榻几屏障,勾画准确,亦为元代家具与室内布局的典型史料。

明、清以降,中国传统建筑实物在南、北各地多有遗存,因而自明以降的建筑画史料意义重在历史记叙性,而非形象的精确性;有关画作年代与画家的真伪亦不再注重。

明代绘画是绘画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之一。因城市生活与手工业、商业的兴盛,文人画和民间绘画都获得极大发展。其中,前者以吴门画派为代表,后者以明刻版画最突出。就建筑史料角度而言,二者在类型与范围方面都提供较之前述历代更为丰富形象资料。

文人画在明代达历史鼎盛期。其中山水画较人物画发展为盛,但涉及建筑的作品不及人物画丰富。如山水画有:文征明的《真赏斋图》、《琴鹤图》、《金陵十景》、《拙政园图》等,仇英的《吹箫引凤》,钱谷的《虎丘小景图》、《竹亭对棋图》和《求志园图》,安正文的《岳阳楼图》与《黄鹤楼图》;人物画有:仇英的《春夜宴桃李园图》等,杜堇的《玩古图》等,均刻画精细,形象准确。明代人物画的主要人物如仇英、丁云鹏、陈洪绶、萧云从等,画作中涉及建筑、尤其是室内家具与装饰形象不在少数,并在版画方面也有大量佳作,其中又当数仇英为明代建筑类绘画的代表人物。

风俗长卷画有佚名之作《皇都积胜图》,描绘明末北京城内主要商业街区景象,用笔细腻、丰富,对于今已未存之明末北京街肆,不失为写实性史料。

清代宫廷不设画院,但宫廷绘画活动盛于明代。尤为重要是西教士如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画家入宫作画,服务朝廷,引入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透视画法,对中国传统绘画形式产生一定影响,如清宫如意馆宫廷画家焦秉贞及其学生冷枚等在画作中模仿运用,遂于中国建筑画的绘制方面出现新的手法。

清代宫廷绘画涉及建筑类的重要作品大多在康熙年间,参照聂崇正先生近年整理出版的《清代宫廷绘画》及有关资料,主要有:王翬等人绘制的12卷本《康熙南巡图》,陈枚的《山水楼阁图》,王原祁、冷枚等绘制的《万寿图》,焦秉贞的《历朝贤后故事图》、《耕织图》等,冷枚的《养正图》、《十宫词图》、《避暑山庄图》、《汉宫春晓图》和《耕织图》等,沈瑜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沈源的《山水楼阁图》、《夷则清商》及其与唐岱合作之《圆明园四十景》,金廷标的《仕女簪花图》、《画御制用庚信咏画屏风体》等,徐扬的《京师生春诗意图》等,孙祜的《雪景故事图》,金昆的《有鸟诗意图》,张若澄的《静宜园二十八景图》,张廷彦的《弘历行乐图》等,方琮的《仿倪瓒狮子林图》,郎世宁的《弘历雪景行乐图》、《平定西域武功图》等,冯宁的《古庆图》,另有佚名之作《绘本金瓶梅》、《圆明园西洋楼图》、《康熙六旬万寿盛典图》、《胤禛妃行乐图》、《岁朝图》、《万法归一图》、《颀琰古装行乐图》,有无款院本《汉宫春晓》、《月令图》等等。这批宫廷绘画所涉清初建筑、园林与室内装饰的造型以及历史事件,多具有明显的史料价值。

清代山水画中,以雍正年间的袁江所作界画涉及建筑最多,其手法承袭郭忠恕与赵伯驹、刘松年等青绿画派,是“有清一代推为第一”的界画大家。曾作有《瞻园图》、《东园图》、《梁园飞雪图》、《水殿春深》、《秋山楼馆》等等。其中《东园图》为扬州某处园林式别业的写实之作,较之其他仿古意趣的作品更具史料

价值;袁江之侄袁耀亦专工界画,作品有《邗江揽胜图》、《观潮图》、《秋江楼观图》、《九成宫图》等等;还有张廷彦的《中秋佳节》等。

人物画则以乾嘉年间为盛,沪上最为发达。其中较重要的有:上官周、改琦、费丹旭的仕女画和任熊等人的人物画,画中多配有描画清晰的古代家具和摆设,可用作家具等物的造型参考。此外,清宫廷盛行人物肖像画,艺术造形极为死板,唯人物坐具描绘颇工,可作清宫廷家具造型参考。

风俗画中,以宋骏业的《南巡图》和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所涉建筑形象最为丰富,图中所绘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梵宫莲宇,高门甲等;歌舞台榭,春船夜市;甚至还包括万年桥与城楼等等,充分展示了姑苏繁华之景。该图较之《清明上河图》更为细腻和写实,为清代康熙、乾隆二代苏州城的重要形象史料。

(五)界画:

界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种类之一,专指以界尺为辅助工具绘制而成的宫室楼台和舟车家具等器物图画。其技法初见于东晋顾恺之的画作与论述,南北朝时有“陆探微屋木居第一”,至隋始具规模,唐代渐趋繁荣,五代有明显进展,至宋达鼎盛,元则以工细见长,明代已见式微,清初曾一度振兴,中期后明显衰落。界画技法初时仅用于配景,隋、唐以后发展渐趋独立,遂运用于主题形象。

隋代界画手法或用于为人物画作配景的宫室、家具等形象,或用于为山水画作配置器物的楼阁、舟车。擅长此道者有杨契丹、展子虔,成就最高者当数河南汝南人董伯仁,有《杂画台阁样》等作品。

唐代界画已开始出现于名家画作中。如: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阎立德、阎立本父子,吴道子、张萱等,有专工界画的画家擅智敏、桓言、桓骏、楚安、郑传等。由于当时画论评其形象“无生动可拟,无气韵可侔”(张彦远),故被视为“死画”,不受画界重视。

五代界画传世作品虽然不多,但已显示出相当进展。擅作界画者有:尹继昭、卫贤、王齐翰、顾闳中、周文矩、朱澄、赵忠义、胡翼、朱简章、赵元德、朱棕、陶守立等,其中当数卫贤成就最高。

宋代因画风崇尚写实,界画手法颇受画院重视,画院待诏多有擅长此道者。如:张择瑞、李唐、刘松年、李嵩、马远以及青绿画派的赵伯驹兄弟等。另据文献所载,当时最突出的界画家为郭忠恕,可惜只有片段作品传世。因此,宋画院以界画最工,水墨、设色者均有,用色古朴;界画技巧亦较之历代为精,以写实和精确见长。

元代界画在画面构图上更突出建筑主体,多为绢本水墨形式,题材或为神仙楼阁,或为汉宫唐苑、宋代名楼,绘制笔道细如毫发,极尽工夫,建筑构图多呈气势雄奇,唯形象不及宋界画精致典雅。主要画家有:王振鹏、李容瑾、夏永、朱玉、何澄、卫九鼎等。

明代界画因文人画的兴起而渐趋式微,绘作手法对唐、宋有承袭,画作多设色,或淡雅,或明艳,文人品味突出,装饰性明显增强。主要画家有:安正文、石锐、杜堇、仇英、许仪、詹林能等。

清代界画曾于康熙至乾隆年间在扬州一度获得复兴,早期有李寅、颜樾、颜岳等一批人物,至袁江、袁耀遂成为大家。此外,清代宫廷画家、尤其是如意馆的亦擅作界画,如:焦秉贞、冷枚、沈嵩、沈源、唐岱、张廷彦、陈枚、张若澄、金廷标、徐扬等。因清代画界视界画为“匠所能为”,致使界画地位再次下降,遂趋衰落。

上述历代界画的主要实例在第四节中多已涉及,故不再一一序列。由于界画是以表现建筑类艺术形象为主题的绘画种类,今以建筑史和文化史意义观之,价值尤较他类画种更为突出。

(六)版画

版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种类之一,泛指以雕版、活版和彩版套印方式绘制的画作,主要用于民间绘画领域,包括道释画、各种书刊插图(包括宗教经卷)、年画及各种风俗画。

中国版画始于何时尚难确定,现存最早作品见之于唐代佛教经卷(咸通九年),发展地域由唐代的成都、敦煌等西北地区的佛经书坊开始,逐渐向东、向南传播,绘师与刻工多为民间艺人;宋、辽、金、元时经开封、临汾传至北京,尤其是宋代雕版印刷术的进步有效地促成了版画的广泛发展;明、清时期,版画发

达地区南移,以东南沿海几省(如福建、江苏、浙江、安徽)发展最为兴盛,尤其是明万历年间,版画艺术发展到一个相当辉煌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版画绘制水平因有宫廷画家参与而获大幅度提高,镂版世家的形成也使镂刻手艺明显提高;这一盛况自明万历始,经天启、崇祯延续到清康熙、乾隆、嘉庆止,道光而后渐趋衰落;清后期版画虽于应用范围上更为普遍,由话本小说、年画、宫廷绘画等方面扩展到清末的新闻报道,唯绘刻艺术远不及明代流畅典雅。

中国版画中涉及建筑类史料者不在少数。其中两宋与金、元时期版画应用范围虽然渐趋广泛,经、史、子、集类书籍均有以版画作插图者,但因宋、元版画书传世于今者甚少,故涉及建筑类的更不多见,只有少量经卷扉画传世;明、清两代版画数量大增,图中所涉类型亦极广:城市村镇、离宫别苑、坛庙寺观、学宫书院、衙署街市、住宅庭园、名胜古迹、室内装饰、家具摆设、装饰图案,等等。由于明、清两代建筑类实物遗存较多,图绘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形象的历史性和丰富性。基于版画资料往往会在同一本书中涉及多种建筑类型,为叙述之便,试将资料按来源性质分为以下7种,进行简述:

(1) 宗教经卷类:

早期版画的遗存主要来源于佛教经卷,所绘形象以佛像及其故事为主,图中涉及建筑内容极少,主要为宗教类,形象亦多为示意性描画,史料价值一般。如:宋庆元间的《妙法莲华经卷首图》,元至顺间嘉兴路顾逢祥等主刻的《妙法莲华经扉页画》等。

(2) 类书:

类书是中国古代汇编式的百科全书。辅以插图的类书较早的有元至元六年陈元靓编撰的《事林广记》,画作形象甚为简易;其后有明万历三十七年王圻等编撰的《三才图会》,所涉资料颇为广泛,绘作图形较元代有所进步,是为明代建筑的参考史料之一。自《三才图会》之后,明、清大型类书多附插图,如明《永乐大典》、清《丛书集成》等,所涉建筑类史料以地方志为多。

(3) 文化技术类:

包括典章制度、道德训喻以及有关衣、食、住、行的耕织、养生、营造、军事等内容。其中具有明显史料意义的图作有:北宋元符三年李诫的《营造法式》、淳熙二年聂崇义集注的《新定三礼图》、庆历四年的《武经总要》,金蒙古乃马真后元年的《孔子祖庭广记》,明万历的《鲁班经匠家镜》等等。此外,明、清两代各种版本的《耕织图》、《农书》、《饮膳正要》、《养正图解》、《便民图纂》、《授衣广训》、《圣谕广训》、《日记故事》、《帝鉴图说》、《孔圣家语》、《列女传》、《闺范》、《状元图考》等均含有一定的建筑类参考资料,尤其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年的《钦定书经图说》,全书计有五、六百幅历史题材的图作,虽不可用作建筑造型的历史凭据,但所涉内容之丰富,仍不失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4) 诗画图谱类:

包括各类画谱、图谱、人物画专集、艺术类版画及图绘册页类。宋、元时期的图谱见于记载的尚有一些,但流传至今、且涉及建筑者极少,唯有金承安间平水坊刻《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又名《四美图》)一图,涉有局部金代栏板形象。图谱类主要流行于明、清,其中涉及建筑类形象较为集中者有:明万历间的顾正谊绘撰的《百咏图谱》(又名《顾仲芳咏物图谱》),顾炳摹辑的双桂堂初刻本《历代名公画谱》,集雅斋黄凤池等辑刻的《唐诗画谱》,宛陵汪君辑绘的《诗余画谱》,丁云鹏等人绘刻的《诗谱》;明崇祯年间雄飞馆的《英雄谱图赞》(即《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合传》);清康熙间王槩等绘辑的《芥子园画传》等;另有雍正四年陈梦雷原辑、蒋廷锡重编的内府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图谱》曾有专册刊行,因未曾得见实物,不知其中建筑类史料几何;清末还有上海吴友如主编的《点石斋画报》,图中所绘上海清末民初的某些建筑场所(如妓院、当铺等)今已不存,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人物画图集中含有明、清乃至民国期间建筑类形象的作品主要有:清乾隆间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咸丰年间任熊的《于越先贤像传赞》、《剑侠像传》与《高士传图像》,光绪间费晓楼的仕女画,改琦的《红楼梦图咏》,上海大东书局印行的《吴友如真迹全图》,民国时上海世界书局印制的《马骝画谱》等等。此外,陈洪绶、萧云从的人物画中时绘有一些造型独特的仿古家具,亦可用作家具造型参考。

(5) 方志游记类:

包括地方志与名山、名水、名园、名城的志略、诗话、年谱、图说及游记等。

方志的图、文都是建筑类史料的重要来源。其附图一般多位于卷首,也有少数随文而设。方志卷首图通常包含城图、衙署、学宫、书院、地方名胜、古迹或礼制建筑等内容。现存的早期方志大多收入中华书局1990年印《宋元方志丛刊》1—8卷,明代则以天一阁嘉靖年间的收藏最为集中。宋、元时期方志附图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宋景定五年马广祖等纂修的《景定建康志》,嘉定十六年陈耆卿纂修的《嘉定赤城志》,咸淳四年潜说友纂修的《咸淳临安志》,淳熙十三年陈公亮等纂修的《淳熙严州图经》;元至正四年张铉纂修的《至正金陵新志》,清徐松修辑、元人编纂的《元河南志》等。这些图作为宋、元时期的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形象资料,具有极为明确的史料价值。

明代修志之风盛于前朝,尤其流行于嘉靖年间,而后明万历、天启及清代乾隆、光绪等朝都有较多的方志刊本。其中较为重要的附图方志有:明洪武二十八年的《洪武京城图志》,弘治年间的《吴江志》、《石湖志》、《阙里志》、《徽州府志》,嘉靖年间的《休宁县志》、《淳安县志》,万历年间的《泰州志》、《钱塘县志》;清康熙年间的《杏花村志》,雍正年间的《陕西通志》、《浙江通志》,乾隆年间的《无为州志》、《苏州府志》,嘉庆年间的《长安县志》、《咸宁县志》,光绪年间的《定海厅志》、《鄞县志》、《杭州府志》,等等。

有关城市史的图形资料除方志之外,尚有经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的城图。诸如:宋吕大防的石刻《长安城图》拓本,宋绍定二年的碑刻《平江府图碑》(宋代苏州城图),咸淳八年的崖刻《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宋代桂林城图),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一书的附图,清乾隆年间的《乾隆京城全图》等等,皆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有关地方建筑类的形象在明、清两代的名山、名水、名园、名城、名寺观的志略、诗话、年谱、图说及游记中多有绘录。如:名胜类的《西湖游览志》、《金陵图咏》、《金陵古今图考》、《申江胜景图》、《海内奇观》、《天下名山胜概记》、《太平山水图画》、《西堂年谱图》、《平山堂图志》、《墟中十八咏》、《盘山志》、《峨山图志》、《黄山志定本》、《北固山志》、《南岳志》、《白岳凝烟》、《占歙山川图》、《山水争奇》、《莲谷八咏》、《武夷志略》等;寺观类的《金陵梵刹志》、《金陵玄观志》、《灵隐寺志》、《昭庆寺志》、《元妙观志》等;名园类的《文园十景》、《扬州东园题咏》、《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等;游记类的《乾隆南巡纪游版画》、武英殿排印本《南巡盛典图》、《扬州画舫录》、《泛槎图》、《鸿雪因缘图记》等。另有明万历间钱贡绘、黄应组刻的长卷式版画《环翠堂园景图》值得一提,该图描绘了一个极为完整而又颇具规模的明代江南(金陵)文人园实例,在版画艺术和建筑史方面均有重要意义。本节所列作品,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风景名胜的规划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地方的祠堂建筑往往绘录在家族的族谱文献中。这一范围的资料尚待作进一步的收集。

(6) 小说传奇戏曲杂剧类:

文艺类书籍插图中涉及建筑类形象的资料在明清时期亦不在少数。由于此类图作多讲求“诗情画意”,内容又与生活场景相关,可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园林及室内空间在人的生活行为中所特有的场所感受,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领悟。因此,就这一类资料的历史研究意义可以说是重在体验、而非形象。

中国文学作品附以插图的方式约始于元代,其影响显然来自唐、宋的宗教经卷版画。最初的附图格式为上图下文,如元至治间建安虞氏刻《平话五种》;明代版刻插图在承袭宋、元传统的基础上又获极大进展,并于明初开始将版刻插图用于元杂剧唱本,使戏曲唱本与小说词话自此成为版刻插图的主要应用范围。同时,东、南沿海的苏、浙、皖、闽地区也兴起了一批著名书坊:建安有刘龙田乔山堂等,金陵有富春堂、世德堂、光庆堂、文林阁、继志斋、环翠堂和万卷楼、大业堂等,杭州有双桂堂、容与堂、顾曲斋、七峰草堂、得月楼、夷白堂、集雅斋、白雪斋等,苏州有三多斋、白玉堂、人瑞堂,等等,等等。版画艺术因此而分为建安、金陵、武林、徽派、吴兴、苏州、北京等派。各派在绘、刻方面均有名家高手,在相互竞技的状况下将版画艺术推进到绘、刻、印俱精的全面发展水平,展示了明、清版画“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插图版画所涉建筑类形象最为繁多,在此限于篇幅,不作细述。仅就艺术性和建筑形象等方面都值得欣赏的作品,主要有:各种版本的《西厢记》、《忠义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琵琶记》、《牡丹亭》、《幽闺记》、《四声猿》、《玉簪记》、《绣襦记》、《燕子笺》、《西湖记》、等,有《隋炀帝艳史》、《西湖二集》、《金瓶梅词话》、《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元明戏曲叶子》、《娇红记》、《吴骚合编》、《吴靚萃雅》、《青楼韵语》、《彩笔情辞》、《月露音》、《玉茗堂四梦》、《环翠堂乐府》、《一笠庵四种曲》、《白雪斋五种曲》、《粲花斋五种曲》、《笠翁十种曲》,等等。

(7)年画类。

年画于明代已经流行,清乾隆、嘉庆年间大为发展,尤其是木版年画至咸丰、同治年间达到鼎盛期,取代了书籍插图在版画艺术中的主要地位。因此,年画所涉建筑类主要为清乾隆以后的形象。

木版年画的发达地区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山西临汾、山东聊城等地,其中又以乾隆时期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所绘建筑形象最为工整。

苏州桃花坞年画的题材或取江南城乡市井的繁华景象,或取苏、杭风景名胜,或取民间戏文故事。因此,庭园楼台、城关街肆、住居府邸等建筑形象多为画面主题,绘制手法除采用传统的“界画”方式之外,还引入了西方的焦点透视法。如《姑书万年桥图》、《三百六十行图》(又名《姑苏阊门图》)、《岁朝图》、《大庆丰年》、《岁朝瑞雪》、《金陵胜景》、《西湖十景》、《全本西厢记》、《读书图》等,皆为优秀的建筑画;《狮子林》、《山塘普济桥》、《姑苏玄妙观》、《姑苏报恩寺》等亦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

天津杨柳青年画因受北京宫廷娱乐风气影响,多取戏曲小说或吉祥喜庆类题材,图中场景多仿戏曲的舞台布景,绘制讲求装饰性效果。建筑类形象因此而以家具摆设居多。如《隋炀帝摒色》、《谢家咏絮昭君出塞》、《孟母断机》等。

上述各节仅为简述,文中所举各图限于时间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有关建筑类的重要图绘史料亦有许多不及收录。故本书仅作为一项阶段性工作提呈给读者,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条件对这一选题展开更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整理工作,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有所支持。

陈同滨

一九九五年六月

中国古典建筑的室内装修装饰与家具陈设

中国古典建筑的装修是指房屋的台基以上, 椽枋以下, 左右至柱间, 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门窗、楹扇。按装修的位置又分为外檐装修和内檐装修。外檐装修指的是建筑物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间隔物, 如门、窗等; 内檐装修即室内装修, 它包括室内大空间按需要分隔为若干小空间的间隔物。中国古建筑装饰则是运用雕刻、绘画、油饰等手段, 进一步丰富建筑的艺术表现力。中国古建筑的装修、装饰和传统的木结构体系及建筑群体布局结合, 成为一个整体, 并与室内家具、陈设相结合, 在建筑的整体造形和细部处理上形成了中国古建筑独有的奇巧瑰丽的艺术风格。

中国古代建筑室内装修装饰发展的几个阶段

任何事物都有其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 室内装修装饰也不例外。中国古典建筑的室内装饰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艺术要求及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演变而逐步发生进展的。

1、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

早在新石器时期, 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人们, 居住在比较矮小的房屋中, 在室内草泥土地面上用石灰质做成坚硬光滑的居住面(一般称白灰面), 使地面更为适用、清洁、美观, 说明当时建筑正处于改进的趋势中。在出土的彩陶表面绘有各种生动而美丽的鱼纹、鸟纹、人面纹和由圆点、钩叶、曲线以及各种几何形图案所组成的带状花纹, 反映出“美”在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商朝已能建造规模相当庞大的宫室建筑群, 在已发掘的石础上发现有盘状的铜盘——铜簠, 盘面上具有云雷纹饰。这些铜簠垫在柱脚下, 起取平、隔潮和装饰三重作用。可见当时宫室内部的陈设相当华丽, 建筑物也可能有某些雕饰。根据甲骨文“席”作“囙”, “宿”作“囙”, 及现存某些青铜器物, 可知当时室内铺席, 人们跪坐于席上, 家具则有床、案、俎和置酒器的“禁”。到春秋时期, 室内仍席地跪坐, 但席下垫以筵, 据《考工记》记载, “筵”应是宫室建筑度量面积的基本单位的一种。家具品种除商朝已有的几种外, 又有凭靠的几和屏风(扆), 衣架(栒)等。据《论语》记载“山节藻梲”和《礼记》所载: “楹: 天子丹, 诸侯黝, 大夫苍, 士黠。”所谓节是坐斗、梲是矮柱、楹即是柱。由此证明春秋时代已在抬梁式木构架建筑上施彩画, 而且在建筑色彩方面已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2、战国至三国时期

从战国到三国, 由于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 几、案、衣架和睡眠的床都很矮。几的形状不止一种, 有些几和案涂红漆、黑漆, 其上描绘各种花纹, 也偶有在木面上施浮雕的。汉朝的案已逐步加宽加长或重叠一、二层案, 用于陈放器物; 食案亦方亦圆; 床的用途到汉代扩大到日常起居与接见宾客。不过这种床较矮小, 又称“榻”, 通常只坐一人, 但也有布满室内的大床, 床上置几, 床后及侧面立有屏风, 还有在屏风上装架子用于挂器物的。长者、尊者则在榻上施帐。东汉末年, 可折叠的胡床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 是当时唯一的高足坐具, 但只流传于宫廷与贵族间的猎狩或战争, 还未普遍使用。

到汉代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式的若干特点已形成, 砖的种类除装饰性的条砖外, 还有方砖和空心砖, 铺地方砖和空心砖有许多是模印花纹或吉祥文字的。建筑所用的花纹题材大量增加, 大致可分为文字、人物、几何和植物、动物纹样五类, 这些纹样以彩绘与雕刻、模印等方式应用于地砖、梁、柱、斗拱、门窗、墙壁、天花和屋面瓦件等处。从许多壁画、画像石(砖)上描绘的礼仪或宴饮图中, 可以看到当时殿堂室内高度较小, 不用门窗, 只在柱间悬挂帷幔。

据文献记载,两汉已用铜做斗拱栏杆和屋顶上的凤凰,以及用金属、翡翠、明珠、绣锦等贵重材料作室内外装饰。色彩方面,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加以发展,如宫殿的柱涂丹色,斗拱、梁架、天花施彩绘,墙壁界以青紫或绘有壁画;官署则用黄色,模印花的地砖和屋顶瓦件等也因材施色。总之,汉朝建筑已经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的装饰,达到结构与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装饰的传统手法之一。

3、两晋至五代时期

两晋和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室内家具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地而坐的习惯虽未改变,但传统家具有了新的发展,如睡眠的床已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榻)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既可坐于床上,又可垂足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摺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摺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对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唐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的前奏。室内多采用覆斗藻井,在敦煌壁画中还可见斗八藻井的图案。天花除方格与长方格平棊外,还有长方形平棊构成人字形顶棚的,由敦煌壁画中看出当时建筑物的天花和藻井绘有五彩缤纷的彩画。

莲花是南北朝佛教建筑上最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盛开的莲花用作藻井的“圆光”,莲瓣用作柱础和柱头的装饰,柱身中段也饰仰覆莲瓣作成“束莲柱”。须弥座的形式也随同佛教传入,先用于室内的佛座,后逐渐用于佛塔与殿堂的基座。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在家具方面,从隋唐到五代,席地而坐与使用床(榻)的习惯依然广泛存在。床(榻)下部,有些还用壶门作装饰,有些则改为简单的托脚。嵌铜及各种装饰工艺已进一步运用到家具上。但另一方面,垂足而坐的习惯在隋唐时期从上层阶级起逐步普及全国。据敦煌壁画和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所示,已有长桌、方桌、长凳、腰圆凳、扶手椅、靠背椅、圆椅和凹形平面的床。在大型宴会上,出现了多人列坐的长桌及长凳。多折的大屏风附有木座,置于室内后部中央,成为人们起居生活和家具布置的背景,使室内空间处理和各种装饰开始发生变化,与席地而坐的室内空间处理已迥然不同了。可见后代的家具类型,在唐末五代之间已经基本具备;家具式样简明、朴素、大方,桌椅的构件有些做成圆形断面,既切合实用,线条也柔和流畅。唐代壁面上往往绘有壁画,天花有平闇与斗八藻井,形制都很简洁,但石窟中的藻井彩画花纹有过于稠密之感。这时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对于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纹样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瑞兽等。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很舒畅而挺秀。此外,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间排列或用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唐朝的建筑艺术,在南北朝成就的基础上,使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高,创造出了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

4、宋、辽、金时期

宋、辽、金时期的建筑受唐代影响很大,在装修装饰和色彩方面,灿烂的琉璃瓦和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增添了建筑的艺术效果。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两晋南北朝陆续传入的垂足而坐的起坐方式,和适应这种方式的桌、椅、凳等家具,到两宋时期,历时近千年,终于完全改变了商周以来的跪坐习惯及其有关家具等。这时期桌椅等日用家具在民间已十分普遍,同时还衍化出很多新品种,如圆形和方形的高几、琴桌与床上小炕桌等。

在家具的造型和结构方面,这时出现一些突出的变化,首先是梁柱式的框架结构,代替了隋唐时期沿用的箱形壶门结构。其次,大量应用了装饰性的线脚,丰富了家具的造型。如桌面下开始用束腰,枭混曲线的应用也十分普遍;桌椅四足的断面除方形和圆形外,往往做成马蹄形,这些造型与结构的特征,都为后来明清家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起坐方式的改变,家具的尺度都相应地增高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建筑室内高度的增加。家具在室内的布置也有了一定格局,出现了成套的精美家具与统一和谐的小木作装修。大体上有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方式,一般厅堂在屏风前面正中置椅,其前方两侧又各有四椅相对,或仅在屏风前置二圆凳,供宾主对坐。书房与卧室的家具布局采取不对称方式,没有固定的格局。另外,适应宴会等特殊要求,家具的布置也出现若干变体如排椅等。由于室内空间加大,并简化了梁、柱节点上的斗拱,给人以开朗明快的感觉。室内“彻上露明造”的梁架、斗拱虚柱(垂莲柱)以及具有各种棂格的格子门、落地长窗、门槛钩窗等,既是建筑功能、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又发挥了装饰作用。室内天花使用平闇减少,而各种形式的平棊和藻井的数量则大量加多,不仅雕刻精美,而且富于变化。彩画方面,继承唐代遗风,在梁架底部和天花板上画有飞天、卷草、凤凰和网目纹等图案,颜色以朱红、丹黄为主,间以青绿。北宋彩画随着建筑等级的差别,有五彩遍装、青绿彩画和土朱刷饰三类。其中梁额彩画由“如意头”和枋心构成,并盛行退晕和对晕的手法,使彩画颜色的对比,经过“晕”的逐渐转变,不至过于强烈。在构图上也减少了写生题材,增加了几何图案,提高了设计和施工的速度,适合于大量建造的要求,后来明清二代的彩画都是由此发展而成的。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政府为了管理宫室、坛庙、官署府第等建筑工程,颁行了《营造法式》一书。此书是上述各种建筑的设计、结构、用料和施工的“规范”。《营造法式》对石作、砖作、大、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可明显地看到宋朝建筑在艺术形象和雕刻装饰加工等方面比唐朝建筑更加周密。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所需要的大小和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这种加工往往采用准确的几何方法而取得。例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进行制作的。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从而发挥其装饰效果,这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的特征之一,在《营造法式》中充分反映出来。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建筑装饰的一大特点。

5、元、明、清时期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时期,给我国建筑的技术和艺术增加了新内容,如伊斯兰建筑与中国建筑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装饰风格,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

元代的宫殿使用了许多稀有的贵重装饰材料,如紫檀楠木和各种色彩的琉璃等。主要的宫殿用方柱,涂以红色并绘金龙。墙壁上挂毡毯和毛皮、丝质帷幕等,这是由于元朝统治者仍延续着游牧生活的习性,同时也受到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恢复、发展、停滞以至崩溃的时期。这时期的建筑,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道路继续向前发展,获得了不少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后一个高峰。

明清家具的特征,首先是用料合理,既发挥了材料性能,又充分利用和表现材料本身色泽与纹理的美观,达到结构和造型的统一。框架式的结构方法符合力学原则,同时也形成优美的立体轮廓,雕饰多集中于一些辅助构件上,在不影响坚固的前提下,取得了重点装饰的效果。家具的类型和式样除满足了生活起居的需要以外,也和建筑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一般厅堂、卧室、书斋、闺房等都相应地有了几种常用的家具配置,出现了成套家具的雏型。至于统治阶级的宫廷和府第,往往把家具作为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在建造房屋时就根据建筑物的进深、开阔和使用要求,考虑家具的种类,式样尺度等进行成套的配制,这在《红楼梦》中关于修建大观园的章回中有详细的描写。

从家具发展方面来看,明代家具以简洁素雅著称。清代家具在造型与结构上继承了明代的传统,但宫廷家具的造型趋向于复杂,同时吸收工艺美术的成就,出现了雕漆、填漆、描金的漆家具,木家具的装饰和雕刻也大量增多,并有利用玉石、陶瓷、珐琅、文竹、贝壳等做成的镶嵌,它的优点是增加家具的华美程度,而流弊则是破坏了家具的整体形象,比例和色调的统一和谐。这种趋向到清代后期更为显著,但广大的民间家具仍以实用,经济为主、很少有此种瑕疵。

明清时期的室内装饰,在北方地区一般地面铺方砖,室内按生活需要,用各种形式的罩、博古架、榻

扇等划分空间,上部装纸顶棚,构成丰富美丽的艺术形象。在江南地区,厅堂内部随着使用的目的,用罩、榻扇、屏门等自由分隔。部分天花做成各种形式的“轩”,形制秀美而富于变化。梁架与装修仅加少数精致的雕刻,涂栗、褐、灰等色,不施彩绘,朴素精雅而富于生气。

清朝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数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官式建筑定型化的结果,不但便于估算工料,加快施工速度,而且建筑造型也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装饰处理形成一定的规格,这种程式化的比例关系和装饰处理规格是长期艺术锤炼的结果,可以保证建筑艺术达到一定的水平。

装饰与古典建筑结构的统一

中国古典建筑是以木构架为主要的结构形式,它充分发挥了材料的性能和结构特性,创造出优美的建筑形体,以及相应的建筑风格。

在满足结构要求的前提下,几乎所有中国建筑构件的形制都是经过艺术上的加工,它们一方面不失其原本的功能形状,同时又显现出极为丰富的装饰性。

以柱体而言,在多数情况下,它保持木材圆形断面和力学上的功能形状,虽然也有使用方柱、八角柱、梅花柱、雕龙柱等,但这只是个别特例。为了使这一构件看起来更为刚柔有力,就产生了梭柱的形式,即柱身逐渐往上收小,柱头则为覆盆形,这在《营造法式》中有详细的规定。

为防止木柱被潮湿的地面腐蚀,在柱脚下垫上一块石头,即柱础。柱础的形制美化问题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对之加工、装饰,因而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各种不同的样式。如唐代喜欢在柱础上雕饰莲瓣,宋、辽金元则除莲瓣外,还有各式花纹。明清在元的基础上重作雕饰,但图案亦崇高简朴。

斗拱是我国木构架建筑特有的结构构件,它是由柱头的结构构件演变而来的,以后又逐渐变为既是结构构件又是富于装饰效果的构件。在整个建筑立面构图中成为很重要的部分,斗拱的形式也逐渐变得纤巧精细、装饰彩绘也逐渐讲究。

木架结构中的梁、枋等构件的断面转角处,一般都加工处理成圆弧状,消除了僵硬感,给人以柔美的感觉。梁架多用断面狭长的木料,斫成“新月”形式,其梁肩呈弧形,梁底略上凹,叫月梁。这种梁架表面虽然素净无饰,但因其梁面呈琴面,梁身又微拱成曲线所以就其构件本身而言,已含有装饰意义了。明清时期一些地位明显的月梁,被施以雕饰,更显秀美奇巧。这也是中国建筑所特有的一种梁的形式。

雀替用在木柱上起垫托作用,主要是缩短跨距,加强额枋的剪应力,防止方形框架的变形,它原来只是一种纯力学上的功能形状,由于在外形上稍加改变,使它象翅膀一样地在柱的上部向两边伸出托住额枋,它那生动的曲线构成的轮廓便成了极富装饰性的图案,柱头部分的装饰问题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在中国建筑中还有一种形状类似雀替的构件——驼峰。但它所在的位置和作用与雀替完全不同,雀替用在梁或枋下集中重量到柱上,驼峰却用在梁上分布重量。它是由稳定瓜柱的两块三角木发展而来,后来用柔和的曲线改变了它的外形,成为梁架中富有装饰性的构件,至清代将驼峰造型更装饰化,成倒扣的荷叶状。

隔架是在明清间发展起来的一种在大梁及随梁间用驼峰、斗拱、雀替组合成的构件,称为“隔架科”,常常安装一攒或二攒,在装饰上有较多的花样,如宝瓶、矮人、十字拱、荷叶墩、雀替等。隔架科在装饰上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做法,它把中国建筑的典型构件都集中在一起,在艺术上是很有代表性的。

顶棚,清官式的名称叫天花,宋也叫平棊、平闇等。它可以用板制或糊纸。有的用向上弯曲的形体叫卷棚轩。也有的向上凸成穹窿状的叫藻井。更有的采用“彻上露明造”的做法,即使檩椽及梁架全部暴露,这就要求将梁、枋、椽、檩等构架做得很光整,有些还绘有精美的彩画。

为保持木制结构免于腐朽、损坏,古人在木结构上涂饰油漆,用以延长木结构的使用寿命。后来就与美观结合起来,而逐渐产生了各种丰富的色彩与构图,成为我国古建筑中特有的一种装饰艺术。